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

【美】鲍威尔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 跃译



MY TWENTY -
FIVE YEARS -
IN CHINA

知识出版社 · 上海

【美】鲍威尔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 跃译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

☆ / 知识出版社 · 上海



(沪)新登字402号

责任编辑 褚赣生
封面设计 陆荣官

JOHN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5年版译出

施威尔对华回忆录

[美] J.B. 鲍威尔 著
邢建榕 薛明扬 徐 跃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邮政编码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毫米 1/32 印张 18.5 插页 5 字数 310,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15-5607-5/k·33

定价: 12.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开始与中国结缘

§1. 东方之行.....	3
§2. 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10
§3. 1917年的上海滩.....	21
§4. 孙中山和袁世凯.....	31
§5. 内战的阴影.....	38
§6. 蓝辛—石井“事件”.....	45
§7. 流亡上海的白俄.....	53
§8. 编辑做说客.....	63
§9. 山东和华盛顿.....	73

第二部分

扑朔迷离的20年代

§10. 前清秀才、基督将军、东北虎.....	87
§11. 临城劫车亲历记	95

223 / 3603

§12. 华南的事务.....	126
§13. 20年代的党派斗争.....	132
§14. “四一二”政变中的内幕故事.....	139
§15. 干涉的外交伎俩.....	155
§16. 采访“中苏之战”.....	164

第三部分

“九一八”枪声响起之后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	179
§18. 苏联、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微妙关系.....	190
§19. 海参崴之行.....	199
§20. 横越西伯利亚.....	212
§21. 1935年的莫斯科.....	225
§22. 取道日本回上海.....	237
§23. 1936年的菲律宾.....	245

第四部分

从“西安事变”到南京的陷落

§24. 西安事变.....	257
§25. 端纳的斡旋.....	271
§26. 西安事变的结局.....	278

§27. 日趋紧张的局势	93
§28. 1937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	305

第五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29. 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323
§30. 越来越重的压迫	329
§31. 炸弹与刺刀	339
§32. 纳粹德国的魔影	347
§33. 历史断线了	359
§34. 日本人的“效率”.....	368

第六部分

战俘生涯及迈向新生之路

§35. 恐怖的大桥监狱	377
§36. “危险思想”.....	391
§37. 美国援华谷物	400
§38. 交换名单	406
§39. 踏上归国航程	411
§40. 中国之未来	421

后 记	426
-----------	-----

第一部分

开始与中国结缘



东方之行

1917年2月初的一天，我搭乘的一艘小货船，缓缓地靠上了上海虹口码头。船一停稳，我拎着自己的手提箱登上了岸，雇佣的一个苦力，扛着我那只洋铁皮衣物箱跟在后面。天正下着雨，黄浦江边的街道显得非常狭窄。街道两旁，是连片的船用货栈和仓库，路面被雨浇得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两辆黄包车从后面紧跟上来，招呼我上车。这种靠人力拉的车，足以容纳一个乘客和行李，但是，我仍决定步行去我要去的旅馆——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 Hotel)①。我这次东来，曾在日本稍事停留，第一次看见了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但此时此刻，我仍对东方的一切感到陌生，不忍心坐在由人类拉着跑的车上。

我这次东方之行，是受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毕业生，在远东地区富有盛名的记者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②电邀，到上海帮助他创办报纸。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要在这地球上政局最动荡的地区呆上25年，来从事报业生涯。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W·威廉的，说他希望聘用一名新闻学院毕业生，协助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威廉院长把电报给了我，而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越洋电报。

这段时间里，我正在为其他两个工作机会犹豫不决，定不下心来。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衣阿华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家经贸杂志邀我作发行人，另一个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报社发行人，聘我作他的助理。可是，到东方去的念头着实具有诱惑力，在我与妻子和同事们认真商量之后，我推掉了以上两个差使，并着手结束大学里的工作。

我不是厄普顿·辛克莱^③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之中”。我出生在密苏里州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就读于当地的乡村学堂，随后在那儿教书。后来靠着帮人发送报纸，一份日报，一份晚报，赚了一点钱，才去伊利诺斯州昆西城，读完高中和商学院。这样过了几年，我进入资深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作实习记者，以便为我去密苏里大学读书赚学费。在密大，我就读的是该校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年后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汉尼巴尔《信使报》(Courier-Post)工作。

这里是马克·吐温^④的童年居住地，声名遐迩。我在《信使报》里先后做过发行部经理、广告部经理和报纸市政专栏编辑。四年后，我重回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讲师。

那时，我同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对遥远而陌生的东方的全部知识，只是从学校的地理和历史教课书中获得，不过几页文字而已，而且地图绘制得错误百出。即使在大学课堂里，我也记得仅在一两次课程中，教授讲到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中国史，并且语多不恭。

在密大新闻学院，我认识了几位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黄兴(译音)，他出生于广东，并在檀香山呆过。他跟我共同筹办了“天下俱乐部”，成员包括许多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另一个是我教过的学董显光^⑤，他来自上海。黄和董后来均成为

中国新闻界的著名人士，但两人的政治立场相去甚远。还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名字叫户田，虽然身材矮小，但在学生义勇军中表现出色。他来美国读书之前，已经在日本军队中当了三年大兵。

我即将去上海帮助办报这件事，激起了许多同学的巨大好奇心，甚至不无羡慕。实际上，我自己对那张报纸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同时，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弄得我心烦意乱，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一个朋友跑来问我，能否阅读“鸡爪印”似的中国字？说着，递上一张当地中国洗衣坊开的发票，要我念给他听；新闻学院的理发师，则问我是否要留一个“辫子式”发型。

随着到中国去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对于未来的办报工作也逐渐有所了解。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关于小报的组织纲要，在一家报纸刊出后，受到小报馆的普遍采用。可是，这种文章对我的新工作有否用处？上海要办的报纸属于哪种类型？我要不要写社论，拉广告，推销报纸？或像通常的小报一样，每样事情都得自己干？就像我先前在《信使报》工作时，除了排字，几乎样样都做。另外，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印刷工人工会，中国报纸是否采用能铸造5000个汉字的新型铸造活字机？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期中国报纸的常用字数量。

为了获取尽可能多有关中国的知识，我翻遍大学图书馆，总算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另一本是《中国农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作者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Dr. Arthur H. Smith）^①，他在华传教50多年。他以言辞幽默著称，这在他的书中也随处可见。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喜欢他写的书，认为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描述过于猎奇，不切实际。我刚到上海时，曾听过明恩溥

博士就北京政治状况发表的演讲，当时北京政府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即反动势力阴谋复辟清王朝。演说后，明恩溥博士就动身回美国安度晚年。在他的这次演讲中，他结束时说道：“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令在场的每个人，特别是新来的外国人心情沉重，久久不愿离去。这时，明恩溥博士风趣地眨眨眼睛，然后紧接着说：“事实上，从我50多年前来到中国时起，这个国家一直站在悬崖边上。”真是妙语连珠，大家的沉重心情，不禁为之释然。

1917年1月，我乘坐一艘日本远洋客轮“日本丸”，从旧金山出发前往中国。当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已经历时三年了。客轮停靠日本长崎，即到达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站时，情况仿佛有些不妙。长崎是最早与外国人交往的城市，历史悠久，我们上岸游览，逛街购物，忽然一位船员匆匆赶来，说船长奉上级之命，所有欲往上海的乘客，都须回到船上取下他们的行李，留在长崎自谋出路，客轮将改驶马尼拉。我和另外两三位同船的乘客，虽然是买了前往上海的票子，但这时突然发现身不由己，孤立无援，被人扔在长崎这个陌生的港口城市里。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去长崎轮船公司打听，看看有没有其他客轮前往上海。但轮船公司说，在三个星期内，不会有客轮驶往上海。由于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我只好去碰碰货轮的运气。港口内正好有几艘货船在作业。于是雇了一条舢舨，在港口内到处转悠，总算找到一位船长，肯带我去上海。他给我一个舱位，条件是把我的那张越洋船票给他，另付10美元，途中膳费自理。

几小时后货轮就要起锚，因此我匆匆取来行李，顺便买了一些途中的食物。船长只能说一点蹩脚英语，而且对美国人也毫无兴趣。

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没有一丝阳光。但当船穿过九州西边海岬时，太阳冒了出来，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这时，我开始闻到船上有一股呛人的臭味，而且随着天气变暖，这股臭味愈发厉害，令人作呕。我跑去问船长，为什么船上竟有这种臭味？他指了指甲板上和船舱里的货——全部用稻草捆绑着，看不清是什么——然后说：“臭腌鱼，只有中国人吃的臭腌鱼！”几个星期后，我的衣服上仍有这股臭味，而在我的脑海中，似乎几年之后才算抹掉了它。

虽然如此，我能登上这艘船实属幸运。另一艘在俄国海参崴注册的“波特娃”号，一星期后自长崎载客开出，在中国海遇上台风，被刮到近上海南面的海岸边，经过艰苦的救援，才使船上的乘客脱险。

在我从旧金山踏上东去之路时，我还不知道那时经营横渡太平洋航线的客货轮，都是在日本注册的。后来经营太平洋航运极具影响的多拉尔(Robert Dollar)船长，曾被迫将他的货船改到加拿大注册，而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太平洋邮船公司，只好收缩到南美和巴拿马运河航线。在美国即将投入大战的紧急关头，仍迫使美国撤回不甚发达的太平洋航运的原因，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拉福莱特法案》(La Follette Act)，它由威斯康星州自由派参议员拉福莱特^②提出，旨在帮助美国海员。在这项法案中，有一款明确规定美国船主不得雇佣东方海员。由于美国船只付给美国海员较高的报酬，而英、日船主雇佣大量低薪的东方海员，因此，两者之间竞争的结果不言自明，美国无法继续经营太平洋航线，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从这一航线撤出，要么改在英国注册，因为英国允许雇佣中国水手。实际上，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好水手一样，中国水手工作效率高，为人可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在英国注册的船只撤到

了大西洋，结果是让日本人独揽了太平洋航运。直到战后，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以与商人签订奇怪的运送邮件协议的形式，由政府出资建造船只，美国商船才重回太平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可以说除了几艘军舰外，没有任何其他美国船只。

注释：

- ① 礼查饭店 (The Astor House Hotel)，即今上海外白渡桥北堍的浦江饭店。始建于1860年，为上海开埠后第一代新式旅馆。
- ② 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密勒 (Thomas Frank Lin Fairfax Millard, 1808~1942)，美国报人，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任主笔，立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17年创办《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后被北洋政府聘为对外宣传顾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密氏仍充顾问。
- ③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美国作家，其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黑暗，代表作有《屠场》等。
- ④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美国作家，著名的长篇小说有《镀金时代》《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作品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生动，以幽默讽刺见长。
- ⑤ 董显光(1887~1971)，浙江宁波人。1909年留学美国，攻读新闻及法律。1913年回国后，历任《中国共和报》副主编、《北京日报》主笔，《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及参议院英文秘书、交通部参事。1929年，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兼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曾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去台湾。

- ⑥ 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 美国公理会牧师, 1872年来华传教, 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 ⑦ 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1855~1925), 美国国会众议员、参议员, 曾三度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2

密勒和《密勒氏评论报》

礼查饭店是当年上海第一流的旅馆，其前身是早年来华的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一座供膳公寓，——他把自己的船留在了上海，其名字也来源于美国最著名的纽约礼查饭店。但是，这位船长不得不在名称上加添“旅馆”这个字眼，因为纽约礼查饭店的大名，还没有传到中国。除了名称以外，这两家饭店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海礼查饭店四面临街，由两幢三层和四层高的楼房组成，有长长的通道串连着。饭店的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厅院，晚上交响乐队常常在此演奏。晚上8点起，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下来进餐，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上海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坐在饭店的大厅里，张开眼睛随便看看，那么，你几乎可以看到混迹于这个城市的所有骗子！”

我寻到礼查饭店后，打听下榻在此的密勒先生住几号房；一位仆役轻声地说，他就住在饭店里，并且马上就会来大厅坐坐，我刚想问他长得如何模样，那仆役就叫我看一位正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只见那人身材单薄，体重125磅左右，但穿着异常考究，我不由突发奇想，他怎么能够在坐下来的时候，不弄皱他那套笔挺的西服呢！

我的老板密勒先生曾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工作数年，先写戏剧评论，后做国际政治记者，继承了已故的《纽约先驱报》主持人贝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许多怪癖。

自然，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上海报纸的许许多多问题，但密勒似乎不急于告诉我；何况我们也无暇谈及，因为我们马上被正在吃午茶的许多莫美人围住闲聊。所谓的“茶”，实际上是指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

这种不受拘束的饮酒，不由使我心痒痒的，因为我生长在美国中西部自动禁酒的土地上，而且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正接近于1920年开始的持续几年的“大实验”(“great experiment”)①。围谈的人愈来愈多，仆役又搬来一张大桌子，好放置更多的酒瓶和杯子，当新进来的人过来寒暄时，他们总是要求同已在场的再干一杯，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喝了一杯又一杯。仆役在每次上酒后，都把一张帐单递给要求干杯的人，付款的主人，则从来不瞧那帐单上的金额数目，一签了事。

在我坐等密勒先生的时候，看了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上面刊载了路透社的一则重要电讯，说美国已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1917年2月3日。但在我们的谈话桌上，却没有一个人说起美国参战之事，相反，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酒”字上，说美国可能采取酒类禁运措施，以及由于英国航运业衰落，限制了酒类运输，导致酒价不断上涨等等。但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上海总是有酒喝的，至少在酒这个问题上，英国人要比美国人明智得多。

这时，一位头发灰白、中等身材的人进入大厅，大家的交谈戛然而止。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美国驻沪总领事托马斯·萨蒙斯(Thomas Sammons)。他是一位可爱的官员，只是经常担